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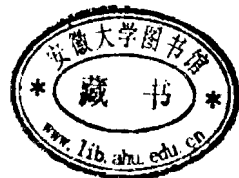
六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 17 冊

《水經注》與北魏史學

陳識仁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《水經注》與北魏史學／陳識仁 著——初版——台北縣永和市：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8〔民97〕

目 2+152 面；19×26 公分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；第 17 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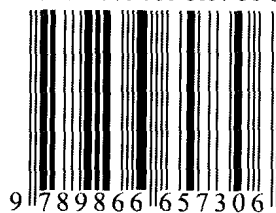
ISBN：978-986-6657-30-6（精裝）

1. 水經注 2. 史學 3. 北朝史 4. 研究考訂

682

97002072

ISBN - 978-986-6657-30-6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六 編 第十七冊

ISBN：978-986-6657-30-6

《水經注》與北魏史學

作 者 陳識仁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電子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初 版 2008 年 3 月

定 價 六編 3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46,5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《水經注》與北魏史學

陳識仁 著

作者簡介

陳識仁，1969 年生，台灣桃園人。

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學士、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、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。

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、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。

研究領域以中國中古史、中國歷史地理、中國史學史為主。

提 要

酈道元《水經注》總結隋唐以前地學成就，明清以來，考證校釋者眾多，形成「酈學」一派。本書無意加入這場清代以來的樸學探討，而是在前代學者堅實的校勘基礎上，試圖回歸酈氏生存的歷史時代，探究他撰注《水經注》的動機與目的。

筆者認為，欲探究酈氏撰書的動機與目的，必須從北魏史學的角度入手，並從酈氏生平事蹟與北魏政局的互動中加以觀察，才能有所獲見。全書為使討論焦點能夠集中，分別即從「史學與時代背景」、「酈道元生平活動與《水經注》」兩大主題進行。剖析北魏史學歷程的腥風血雨，導致與史官交遊頻繁的酈氏廣涉史地知識，卻轉而撰注地理典籍，在太和改革的時代氣氛下，為北魏帝國提供一幅治國藍圖的可能性。

謹以此書

紀念遼耀東、康樂兩位先生



目次

第一章 前言	1
一、研究動機	1
二、研究回顧	3
三、史料運用	5
四、章節結構說明	6
第二章 北魏修史歷程	9
第一節 北魏修史機構	10
第二節 北魏的修史分期——以《魏書》成書過程為主軸	29
第三節 崔浩「國史之獄」及其影響	44
小 結	56
第三章 酈道元的仕途與宦遊	57
第一節 酈道元的仕途經歷	57
第二節 酈道元的宦遊關係	71
小 結	82
第四章 《水經注》的地學傳承與資料基礎	83
第一節 隋唐以前的地學傳承	83
第二節 北魏的官私藏書	98
小 結	107
第五章 太和改革與《水經注》	113
第一節 太和改革與新舊之爭	113
第二節 《水經注》與帝國藍圖	127
小 結	138
第六章 結 論	141
徵引暨參考書目	145

圖表目錄

表 2-1	北魏時期任著作省職官人物一覽表	14
表 2-2	北魏時期監、修起居注諸人物一覽表	24
表 2-3	北魏時期監、修國史諸人物一覽表	28
表 2-4	北魏修史諸人暨成果一覽表	41
表 3-1	學者推算酈道元生年一覽表	59
表 3-2	北魏酈氏世系表	63
表 3-3	酈道元年表	69
表 3-4	李彪宦遊一覽表	78
表 4-1	鄭德坤《水經注引書考》分類統計表	84
表 4-2	陳橋驛《水經注·文獻錄》分類統計表	85
表 4-3	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類書籍數量表	89
表 5-1	《水經注》所載較大規模水利設施表	136
圖一	1986 年甘肅省天水放馬灘出土木質地圖	108
圖二	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「地形圖」	109
圖三	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「駐軍圖」	110
圖四	平城圖	111

第一章 前 言

一、研究動機

北魏酈道元所撰的《水經注》，是現今僅存少數幾部北朝著作中，相當重要的一部〔註1〕。由於《水經注》內容是以當時的河流渠道為記述對象，內容雖然包羅萬千，一般卻多以地理書籍視之，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即將它列入〈史部·地理類〉。由於中古時代地理書籍多已亡佚，得以傳世的《水經注》反而保留了這類著作的吉光片羽，這種「無意」的史料保存價值，使得後世對於《水經注》的瞭解與利用，往往也就被限制在這方面，視之為史料來源之一而已。

今本《水經注》在宋代的書目中，就已著錄缺佚五卷，以後更由於傳鈔的問題，致使經文與子注混雜不分，全書已非原初面貌。在清代校勘學的堅實基礎下，不少學者將心力投注於此，總算將《水經注》復原為可讀之本。但是，其間卻引發了所謂的「全戴趙抄襲案」——全祖望、趙一清、戴震三人之間抄襲《水經注》校注本之說。胡適晚年也對此問題下了相當大的功夫，並自稱是從事替人「打官司」的「律師的新職業」〔註2〕。《水經注》研究盛極一時，博得「酈學」稱號，與「紅學」並駕齊驅。版本校勘在清代學者的努力下，不僅解決了諸多問題，更獲得極大的成果，

〔註1〕北朝著作至今傳世，且基本上能保有原來完整風貌者，以酈道元《水經注》、楊銓之《洛陽伽藍記》、賈思勰《齊民要術》與魏收的《魏書》等四部最為重要。

〔註2〕胡適大約在1943年起，開始注意抄襲案的問題，他在1944年1月17日寫給楊聯陞的信件末尾裡說道：「這是做考據的胡適之『實事求是』的辦法。可是這都是於我做律師的新職業很不利的！所以這官司就越打越有趣味了。要知道這官司的如何判決，且待下回分解」；見胡適紀念館編，《論學談詩二十年——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8），頁18。再根據胡適紀念館整理出版的《胡適手稿》來看，在總數的十冊當中，關於《水經注》版本的考證文章就佔有六冊之多，可說胡適晚年的精力，都耗費於此。

後人實難望其項背或超越向前，本書的研究重點亦不在此。

引發本書撰寫的動機，緣於《水經注》之序文，酈氏於序文中自云：

昔《大禹記》著山海，周而不備，《地理志》其所錄，簡而不周，《尚書》、《本紀》與《職方》俱略，都賦所述，裁不宣意，《水經》雖粗綴津緒，又闕旁通，所謂「各言其志」，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〔註3〕。

可見酈氏撰注《水經》，是對古來地理書籍頗多不滿，因此興起以《水經》為藍本，加以注釋的方式，試圖寫就一部能「旁通」且「備其宣導」的地理書籍。有趣的是，酈氏在接下來的序文中又說道：

余少無尋山之趣，長違問津之性，識絕深經，道淪要博，進無訪一知二之機，退無觀隅三反之慧。……默室求深，閉舟問遠，故亦難矣。……竊以多暇，空傾歲月，輒述《水經》，布廣前文。……（故）脈其枝流之吐納，診其沿路之所躋，訪瀆搜渠，緝而綴之〔註4〕。

可見酈氏撰注《水經》時，不僅廣參書籍，甚至親自「訪瀆搜渠」，就這點而言，似乎是違背了他所自言「余少無尋山之趣，長違問津之性」的性格。當然，我們可以將這句話視為酈氏的自謙之辭，但筆者認為，應當有更充份的理由，來說明酈氏何以「違背」本性，花費極大的心力完成《水經注》。

酈道元在序中的這段自白，不禁讓人提起一連串的問題：酈道元為何要撰《水經注》，只為像他自己說的，是針對古來地理書籍的不滿，還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？酈氏一生的事蹟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如何？與撰《水經注》有沒有內在的關聯？他對地理知識的興趣源於何時？如何進行相關的知識探索？再者，《水經注》中所徵引的大量典籍，仍為今人所嘆服，但酈道元並未擔任過修史或掌理圖籍的職官，他藉由什麼樣的管道，得以閱覽大量的典籍，並且援為注解《水經》之基礎？北魏時代的圖籍保存狀況又如何？當時正處於一個政治對立的南北朝分裂時代，酈氏終生不會到過南方，想要瞭解南方的水道溝渠，也只能借助於圖籍，他又何如獲得關於南方的地理書籍？南方圖籍又是經由什麼樣的管道進入北魏？最後，他撰《水經注》的用意又是什麼？當然，資料的不完整，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最主要障礙，但在經過文獻資料的閱讀後，筆者認為未嘗不能進行研究，於是試圖解答這一連串的問題。

隋唐以後的書籍目錄，多將《水經注》歸列為地理類，而在中國傳統學科分類當中，地理類又被視為廣泛的史學內容之一。因此，上述一連串問題的解決方法，

〔註3〕〈水經注序〉，此據《永樂大典》本《水經注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據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永樂大典本，1998），頁1。

〔註4〕酈道元，《水經注·序》，引文出處同上。

可能從北魏史學的角度出發，會更容易處理些〔註 5〕。因此，本論文之首章，即從北魏的修史事業開始說起，再隨著前後問題的關連性與提問，逐步嘗試解答。

二、研究回顧

由於上述問題所牽涉的範圍極廣，除《水經注》一書的研究之外，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頗豐碩，以下擇要舉例，到目前為止的各類研究成果。

《水經注》版本極夥，除非特意於版本校勘學上，不然運用較具綜合各家研究基礎的版本即可，這方面則以楊守敬、熊會貞的《水經注疏》最為重要，總結了明清以來的校勘成果。1989 年，大陸方面出版了由段熙仲點校、陳橋驛復校的《水經注疏》點校本，可說是目前為止，最好的一部《水經注》版本。早此書幾年，其實已有袁英光、劉寅生點校王國維《水經注校》的工作，唯此點校本標點斷句方面有很多的錯誤，使用時以謹慎為上。

既然吾人認為，應當將《水經注》置於史學史的角度來加以探討，史學史著作對本文的參考價值就相對提高。逢耀東有一系列文章，討論魏晉以來史學史問題，基本上認為：魏晉時代的史學，不僅逐漸自經學的束縛之下獨立而出，並且在個人意識醒覺之下，產生諸如雜傳、別傳等新的史學著作形式，呈現出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多樣性與活潑性。

但是，一般論及中國史學史的著作，對北魏一朝史學的研究，相對地較為缺乏。通論性質方面，以李正奮的〈魏書源流考〉最為早出，是以魏收《魏書》的撰成為主軸，討論其書源流。其餘個別課題的研究，多集中在崔浩史禍與「穢史」《魏書》二事上。這方面的研究甚夥，前者的研究有：陳寅恪的〈崔浩與寇謙之〉、王伊同的〈崔浩國書獄釋疑〉、〈魏書崔浩傳箋註〉、牟潤孫的〈崔浩與其政敵〉、周一良的〈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〉、〈崔浩國史之獄〉、孫同勛的〈北魏初期胡漢關係與崔浩之獄〉、逢耀東的〈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〉等，雖各家說法不一，卻都是值得參考的成果〔註 6〕。後者則諸如：周一良的〈魏收之史學〉、孫同勛的〈穢史辯誣〉、瞿林

〔註 5〕大陸方面在 1985 年曾出版一套《中國史學家評傳》，分別評介從春秋到近現代，中國著名史學家八十餘人。其中鄺道元亦是傳主之一，由段熙仲執筆寫作，換句話說，以地理著作知名於世的鄺道元，也被視為史學家。段氏舉出《水經注》中具有：「一字不苟的寫作要求」、「目驗的鑒定標準」、「打破傳不達經，疏不破注的常規」、「強烈的是非感」、「碑刻文物之學的開創」、「解決水名錯綜的發明」、「重視土、特、礦產等能源」的七項特色，並評介認為這些都足以表現一部歷史地理學名著作者的史學家之才、學、識。見氏著，〈鄺道元〉，收入陳清泉等編，《中國史學家評傳（上）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 227～244。

〔註 6〕關於近六十餘年來崔浩案的研究成果，可參見拙著，〈北魏崔浩案的研究與討論〉，

東的〈說《魏書》非「穢史」〉等文，大體皆為魏收作翻案文章。至於北魏修史制度方面，則研究幾乎付之闕如，由於東漢以後，修史與祕書制度有極密切的關係，而北魏祕書省制度則有鄭欽仁的《北魏官僚機構研究》，對此制度進行精密的考證與分析，足資參考。至於北魏修史制度中極為重要的起居注制度，詳細的二手研究則完全付之闕如，本文在這方面的探討，只能憑靠史籍的記載。

至於其他《水經注》相關研究而言，大陸地理學者陳橋驛是目前研究《水經注》用力最勤的學人之一。陳氏不僅著作豐富〔註7〕，許多與《水經注》相關的研究，也都有陳氏參與的腳跡。例如對段仲熙點校的楊、熊注疏本，作進一步的復校工作，並主持《水經注》一書的白話翻譯等，對酈學工作的推展有極大的貢獻。

在酈氏撰《水經注》的用意與動機問題上，也有學者做過討論，例如陳橋驛認為：酈氏一生從未見過統一祖國的人，卻要以歷史上一個偉大王朝的疆域（指漢代）作為寫作範圍，只能說明他是如何地嚮往著一個統一的祖國；歌頌祖國各地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，可見得《水經注》是一部偉大的愛國主義著作，而酈道元則是一位值得崇敬的愛國主義者〔註8〕。香港學者吳天任則認為，酈氏撰《水經注》的用意在於：「道元親歷國家，由盛轉衰，大好江山瀕於破碎，仍欲借注釋『水經』之機會，描畫故國山河之美，並詳敘歷代政俗利弊沿革之往跡，庶幾國人讀之，或有同感，而知愛其鄉國，傳諸後世，亦足為考鑑之資云耳」、「（《水經注》）以西漢盛時疆域為記述範圍，且有涉及域外，其心中抱負，蓋有一中華大一統之理想在」；而其動機則是酈序中批評古來地理書籍不足的一段〔註9〕。曹爾琴則是依酈序為根據，說明酈氏認清在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產中對水的需要，為使當時及後世都能有清楚的了解，便於利用，所以決心寫作《水經注》〔註10〕。以

載《史原》第21期（1999）。劉國石亦撰有〈近20年來崔浩之死研究概觀〉，載《中國史研究動態》，1998：9，可資參考。

〔註7〕陳橋驛對《水經注》的研究，在1985～2007的十二年當中，就出版十本個人的專著，詳見參考書目。

〔註8〕陳橋驛此說，分見其各種著作之中，如：〈酈道元生平考〉，收入氏著《酈學新論——水經注研究之三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27～49；〈酈道元與他的《水經注》〉，收入氏著，《酈道元與水經注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37～44；〈愛國主義者酈道元與愛國主義著作《水經注》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水經注研究二集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35～58；《酈道元評傳》第三章〈愛國主義者〉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33～51。

〔註9〕吳天任，〈《水經注》撰述之背景動機與成書時期〉，收入氏著《酈學研究史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1），頁18～22。

〔註10〕曹爾琴，〈酈道元和《水經注》〉，收入吳澤主編，《中國史學史論集（一）》（上海：

上諸說，陳氏之論未免流於口號，顯然是值得再商榷的，吳氏之說較為中肯，可資參考，而曹氏之說則以鄭序為據，並無較重要之發明。筆者在這方面的解釋，主要則是從北魏一代修史，以及史學史的角度觀察，提供另一個不同的視野，探討鄭氏撰《水經注》的動機與背景。

工具書方面，鄭德坤為三十年代最著名的鄭學研究者之一，最重要的貢獻乃是編纂《水經注引得》一書，對內容繁富的《水經注》一書提供了極為便利的索引工具書。此外，鄭氏並對楊守敬的《水經注圖》進行重新編繪的工作，將楊氏之圖合為 42 楨及總圖 1 張，唯未見付印（註 11），殊為可惜。大陸方面，趙永復編有《水經注通檢今釋》，對於古今河流對照檢索，相當有幫助。從 1984 年起，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計算中心，合作開發了「廿五史全文資料庫」以來（註 12），古代典籍的電腦化持續進行，大部份已置於網際網路上開放使用（註 13）。其中，段熙仲點校的楊、熊《水經注疏》點校本，亦已完成電腦化的工作，正式開放使用。當然，古籍電子化所帶來的方便，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有所助益，但並非唯一的途徑與方法，無庸贅言。

三、史料運用

歷史學之研究，題材除須殫精竭慮外，基礎更須建立於史料之上。傅斯年所謂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材料」正可比擬，所有能用得上的資料都要注意，以下僅針對本論文的撰寫內容臚列重要的史料來源。

《水經注》自然是本文撰寫時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，前已述及，楊守敬、熊會貞的《水經注疏》，不僅吸收了全、趙、戴諸人校勘的成果，且能提出自己的見解，現又有段熙仲點校本出版，運用上更為便利，本論文中所引用《水經注》版本即以此為主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0），頁 347～360。

〔註 11〕 鄭氏重編《水經注圖》完成於 1933 年，後以日軍侵華，鄭氏將圖稿交哈佛燕京社保存，抗戰軍興後，哈燕社解散，圖稿亦失，甚為可惜，幸當時繪圖員張頤年複製總圖一幅尚存，此圖後收錄於吳天任《鄭學研究史》一書之後。

〔註 12〕 「廿五史全文資料庫」的開發與使用，可參見黃清連，〈「廿五史全文資料庫」與中國歷史的研究〉，載《新史學》2：2（1991）；或黃寬重、劉增貴，〈中央研究院人文計算的回顧與前瞻〉，載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第 17 第 2 期（1998）。

〔註 13〕 中央研究院擴充「廿五史全文資料庫」，結合其他典籍的電腦化，稱為「漢籍全文資料庫」，現又改稱「漢籍電子文獻」。包含了整部二十五史、整部阮刻十三經、近一千五百萬字的臺灣史料、六百萬字的大正《大藏經》以及其他典籍，合計字數一億三千八百萬字，並以每年超過一千萬字的速率持續成長，此數據為筆者查詢網際網路所得，亦可參見黃寬重、劉增貴，〈中央研究院人文計算的回顧與前瞻〉一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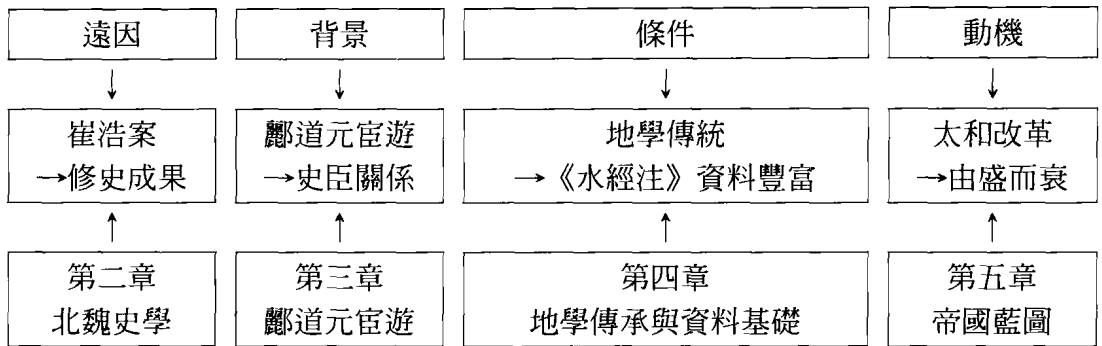
記載西元四至六世紀中國歷史的史籍——即一般慣稱的二十五史中涉及南北朝時代的正史，也是極為重要的史源，諸如：《魏書》、《北齊書》、《北周書》、《隋書》、《北史》、《南史》等。其中就酈道元個人的部份，《魏書》與《北史》中都有其本傳，雖然列傳記載簡略，但在清人趙一清的《水經注釋》書前，附有酈氏《北史》本傳，趙氏加入不少引證資料與詳實的考證，非常便利使用。此外，正史中其他列傳中亦有關於酈氏事蹟者，可視為酈氏的交遊關係資料，是較為學者所忽略的部份，值得加以重視運用。

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，也就是遷都洛陽的前一年，在南巡途中經過比干墓，留下〈弔比干墓〉一文，並刻碑為記。當時從侍人員甚多，多是支持孝文南遷者，除宗室、大臣及武官外，亦不乏史官，這份從侍人員名單就刻錄於碑陰，以酈道元與李彪以及諸史官的宦遊而言，這份名單也能提供些許蛛絲馬跡，以供參考。並可與 1987 年以後陸續發現，文成帝和平二年「皇帝南巡之頌」碑碑陰刻列的從臣組成份子做比較，正可反映北魏漢族士人在孝文帝改革前後地位之差異。除此之外，墓誌銘可補史傳之闕，在南北朝文獻資料不多的限制下，墓誌銘與新近考古出土的資料，應當加以有效地運用，筆者進行北魏修史人物資料搜集時，便從墓誌銘中獲得不少相關材料。

就史學史部份而言，唐人劉知幾的《史通》自然不可或缺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及清人章宗源、姚振宗的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（皆收入《二十五史補編》），不僅有助於瞭解北魏時代的史學史，更能提供北魏藏書的相關資料。涉及制度史者，杜佑《通典》、李林甫《唐六典》雖以唐制為主，但其中多溯源北朝制度，在北朝史籍多闕的情況下，這兩部制度典籍仍是最好的史料來源。至於唐宋以來的各種類書，諸如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，也都可以從中披沙揀金，搜集有價值的材料。

四、章節結構說明

由於本書旨在探討酈道元《水經注》與時代背景，特別是北魏史學的關係，並嘗試解答酈道元撰《水經注》的動機與目的；因此，討論的內容頗為廣泛。為使討論的進行與焦點能夠集中，將從史學與時代背景、酈道元生平活動與《水經注》這兩群主題分別進行，簡單圖示如下：



以下本書章節之安排與內容之探討，即隨之逐步進行。

第二章 北魏修史歷程

北魏末年，酈道元撰注《水經注》，被視為隋唐以前地理知識之總結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將史部分為十三類，地理屬其中之一，《水經注》亦見著錄。暫且不論酈氏撰《水經注》的動機為何，然《水經注》既被視為史部地理類書籍，則酈道元撰注的時代背景及條件，應與當時的修史環境息息相關。因此，藉由探索北魏的修史歷程，或可了解酈道元撰注《水經注》的動機。

那麼，北魏一代的修史狀況如何？歷來有關中國史學史方面的書籍，多未針對北魏修史的制度與情況多加陳述，其中較常被提出討論的是崔浩國史之獄及「穢史」《魏書》兩個問題。崔浩案在經過長期的研究討論後，已獲得較完滿的解決（註1）。而素有「穢史」之稱的《魏書》，作者魏收更是中國史學史上屢被翻案的人物（註2）。

原典中，唐人劉知幾所撰的《史通》，雖曾言及北魏修史情形，但受限於論述主題，僅〈史官建置〉及〈古今正史〉兩個篇章中有概略性的說明，對於想詳其究竟者，畢竟過於簡略。因此，為了對酈道元撰注《水經注》的時代背景與動機有更深一層的了解，本書首章，對北魏修史歷程作一詳細的剖析與論述。全章論旨分為三節，依次討論北魏的修史機構、修史概況與分期，以及崔浩案對後世修史的影響三個主題，並於小結中，歸納本章主旨。

〔註1〕關於崔浩案，最近六十年來的研究討論，基本上不出民族、宗教、社會階級幾個方面的解釋；詳參拙著，〈北魏崔浩案的研究與討論〉。

〔註2〕這方面的研究不少，較重要的有：周一良，〈魏收之史學〉，收入氏著《魏晉南北朝史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），頁236～272；孫同勳，〈穢史辯誣〉，載《幼獅學誌》第4卷第1、2期（1961）；瞿林東，〈說《魏書》非「穢史」〉，收入氏著《中國史學散論》（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182～193。